

# 张爱萍为建设人民海军广集人才

郑学富

渡江战役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由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筹建人民海军，并任命张爱萍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4月23日，张爱萍在江苏省泰县白马庙乡境内的第三野战军东路渡江作战指挥部，正式宣告成立人民海军。

海军是技术性强的现代化兵种，组建海军，必须要有懂得海军建设、管理、训练、武器使用、舰船驾驶、维修和航海经验等方面的人才。

张爱萍不拘一格，大量招募和使用原海军人才，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一年时间里，建立起一支具有较强战斗能力的人民海军部队。



▲张爱萍

## 制定33字方针

张爱萍于1949年4月23日夜带领13名筹建人员连夜渡过长江，于次日上午抵达江阴城，进驻原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开始组建人民海军。当时，新组建的人民海军部队成员主要是两个部分：大部分是从解放军陆军部队选调来的。这部分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对党的事业忠诚，具有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但普遍文化程度偏低，不懂得海军的知识、技术；另一部分是起义、投诚的原海军官兵，成分较为复杂。这部分人有海军知识、技术，有的人还有较长时期的海上工作经验，但其中的大部分对中国共产党尚不够了解，对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优良的传统、作风，也缺乏应有的认识。用张爱萍的话来说，按照一个德才兼备的海军战士的标准，这两部分人都符合要求，都是“跛子”；“建设合格的人民海军，第一个课题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医‘跛子’。”经过深思熟虑，张爱萍制定了一个33字方针：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

随着解放大军南进，张爱萍率领海军机关进驻苏州西塘桥。他成立了8个接管组，分赴镇江、南京等地接收国民党海军起义部队。在工作中，张爱萍发现，有些同志对国民党起义人员仍旧用“国民党”或“旧海军人员”来称呼，很容易在思想上造成距离，感情上产生隔阂。经过思考，张爱萍确定了一种叫法，对于出身于国民党海军、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官兵，要避免“国民党”或“旧”的字样，一律称之为“原海军人员”“原海军同志”。这种称呼在首长讲话和公文行文中使用后，很快被广大海军指战员接受，“原海军同志”更是理解首长的良苦用心，感到说不出的温暖、亲切。

# 朱执信领导广东“反袁讨龙”斗争

贾晓明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广东革命党人纷纷宣布讨袁。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令其镇压革命党人。8月，龙济光进入广州，大肆屠杀革命党人，下令悬赏通缉朱执信、邓铿等革命党人。11月，朱执信派革命党人携武器至广州，秘密准备起义，不幸事泄，被龙济光镇压。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加紧复辟帝制，革命党人纷纷策划反袁举义。朱执信、邓铿也于此时先后返回广东，积极筹划讨伐龙济光的斗争。朱执信不辞劳苦，历尽艰辛，常常来往于广州、南海、佛山等地发动民军和绿林豪杰，筹划起义。经过努力，各地民军多被朱执信说服，表示愿追随朱执信，甚至龙济光所部一些官兵也

愿意倒戈相向。

11月5日，朱执信亲自指挥起义。起义前，朱执信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人在广州散播起义军即将攻打广州的消息。龙济光果然中计，将各地部队大批调回广州。11月11日清晨，战斗打响了，民军毙伤龙济光部数百人。高州等地的革命党人也纷纷起义，攻克了很多城镇，但因枪械不足、弹药短缺，起义失败。

此后，朱执信继续领导“讨龙”行动。他往返于港澳之间，并先后几次派出代表，动员驻肇庆的李耀汉部队和广州的李福林部队寻机起义；又派出钟明光等前往广州，伺机刺杀龙济光。1915年7月17日，龙济光被炸伤，钟明光被捕，后惨遭杀害。1915年11月，朱执信赴日，向孙中山报告广东起义情况，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展“反袁讨龙”斗争，在廖仲恺的介绍下，朱执信加入中华革命党。12月2日，孙中山委任朱执信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并写信给广东地区的革命党人，要求他们“各

事可听执信计划而行”。

朱执信于1915年12月中旬返回澳门，秘密建立革命机关，继续领导广东地区的“反袁讨龙”斗争。12月25日，蔡得、唐继尧、李烈钧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宣布云南独立。朱执信等人积极布置全省各地的武装起义，“或沟通军队，或联络民众，此仆彼继，再接再厉”。

袁世凯称帝后，封龙济光为“一等公加郡王衔”，并命令他调动精锐经广西进攻云南，被李烈钧率领的护国军击败。朱执信为配合护国军的行动，立即发动广东革命党人、民军起义，并准备攻打广州。1916年2月5日，朱执信率民军数千人聚集于石湖村。龙济光得到密报，立即调遣精锐部队前往镇压。8日，民军与龙济光部展开激战，重创龙济光部。不久，龙济光的援军携带大炮赶到，向石湖村猛烈炮击。9日凌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朱执信下令撤退。随后，朱执信又对撤退部队进行整编，准备再战。



## 1930年，红军在安源三次扩红

吴昌荣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扩大红军一直是我党的革命任务之一。中共湖南省委曾多次提议红四军短期占领安源，以吸收大批进步工农群众入伍。1928年5月，中共湖南省委在致毛泽东、朱德的信中提出：“安源是无产阶级最多的地方，党极有基础。目前安源工人痛苦异常……如向萍乡推进，可短期的占领安源，吸收大批的工人加入军队，改造军队的成分……使红军的组织逐渐工农化。”同年7月13日，省委要求红四军攻取萍乡、安源而发出的通告说：“红军取得安源，可以立即武装安源工人万余，彻底进行红军改造。”7月20日和8月12日，省委又两次致信湘赣边特委指出：安源“工人要求当兵，而路又不通，均是红军应即来萍、安的条件”。

1930年5月，黄公略和陈毅率领红六军（不久改称红三军）攻打吉安后，所属第一纵队集中开到湘赣两省边界扩军、筹款、搜集弹药。5月16日凌晨，部队到达安源，驻防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一个连和矿警队稍作抵抗便仓皇逃走。红军进驻安源后即展开了宣传，在附近没收土豪劣绅财物分给工农，号召工农参加红军，得到安源民众的积极响应，形成了如火如荼的扩红运动。安源工农群众踊跃报名，这次参军的工农群众有1000余人。

1930年6月下旬，彭德怀和滕代远所部红三军团之一部来到萍乡，于20日攻克萍乡县城，打开监狱释放被



## 新四军第五师朱荷湾反顽之战

常红

1943年春，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领导边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多次残酷的“扫荡”和“清乡”。5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下令国民党第五战区集中兵力，配合豫鄂皖三省地方顽军，“围剿”新四军第五师，限定6个月彻底肃清。5月上旬，国民党第五战区的顽军各部队开始进犯鄂豫边区，其中，盘踞在湖北浠水县白石山及山下朱荷湾（国民党县政府办公地）一带的顽军鄂东挺进军第十七纵队王丹侯部和国民党保安八团，切断了鄂东与皖西的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的联系，并封锁了第五师南下通道，同时加紧对浠水南部沿江抗日根据地骚扰，经常派小分队袭击抗日武装驻地，捕捉交通人员，企图向抗日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

新四军第五师多次呼吁团结对敌，但国民党顽军置若罔闻，于是被迫采取自卫反击。为此，新四军第五师党委召开会议，决定集中第五师和地委武装近5000人，首先对“反共摩擦专家”王丹侯所部顽军实施打击，此次作战由新四军五师副政委任质斌亲自率队，第十三旅旅长周志坚任前敌总指挥。

6月初，任质斌和周志坚率部迅速进入鄂东，到达黄冈后，立即与当地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等开会，分析顽



## 智澄与西北儿童教养院

郭松林

智澄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革命军，任政治教员。北伐战争中，智澄随部队英勇战斗，多次负伤，后因伤离队，到北平任教。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晋冀诸省难民逃往西北地区者甚多，其中有不少学龄儿童和孤儿。智澄看到很多难民因饥寒交迫而夭亡，心如刀割，于是设法找到宋庆龄，提出“要办个机构收容和教养战争难民”的想法，得到宋庆龄的支持。1939年8月，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派智澄在陕西汉中筹建“西北儿童教养院”。

经过慎重勘察，智澄选定汉中西郊的凹口寺，吴家山、黄家营、赵寨村的古庙和旧祠堂为院址。经过3个月的紧张筹建，11月11日，西北儿童教养院宣告成立，以凹口寺为院部，在周围的吴家山、黄家营、赵寨村设了分部。

12月1日，教养院开始收容沦陷区流亡难民和抗日阵亡烈士子女。由于难民人数骤增，校舍远远不够，经智澄多方努力，申请到一笔建设专款，地方政府划拨土地，新建简易平房20间，1942年春，续建平房50间，终于建成了能收容1000名难童的校舍，并设置了一至六年级班次及成年职业班。

西北儿童教养院的院训是“公诚爱”：“公”就是以大公共服务国家；“诚”就是以真诚回馈社会；“爱”就是以爱心博施济众。院歌是：“西北儿童大家庭，养教并重，厉行人格教

关押的革命分子和工农群众数十人。随后，约1500人的工农群众参加了红军。

1930年9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撤出攻打长沙的战斗后，经株洲、醴陵来到萍乡，在萍萍铁路沿线进行扩红、筹款工作，为进攻吉安做准备。9月22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第四军来到萍乡县城。24日，毛泽东率总前委机关到达安源。同月下旬，彭德怀和滕代远率红三军团总部及红五军亦先后到达萍乡县城和安源。红军进驻安源后，便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革命宣传，张贴《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和《红军布告》，召集群众大会讲解革命发展形势、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以及红军的宗旨和任务，号召支援红军和参加红军。安源“工人要求当兵，而路又不通，均是红军应即来萍、安的条件”。安源“工人要求当兵，而路又不通，均是红军应即来萍、安的条件”。安源“工人要求当兵，而路又不通，均是红军应即来萍、安的条件”。

据统计，红军三次到安源，先后吸收了超过5000人的工农群众参加了红军。这批青年参加红军，不仅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更为粉碎国民党顽军对红军的军事“围剿”、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和政治基础。

军情况，研究作战方案，部署作战行动。

经过周密部署，6月上旬，参战新四军主力挥师东进，途中击溃国民党顽军1个营后，迅速进至朱荷湾附近的张家山地域集结。王丹侯得到消息，马上命令所有兵力收缩到朱荷湾及白石山，企图固守待援。针对上述情况，任质斌和周志坚决定以三十八团首先攻占白石山切断敌人的退路，得手后由北侧向浠水县城攻击；其他部队从南向北攻击，一举歼灭顽军。

6月13日凌晨，新四军三十八团强攻白石山，经过5小时的激烈战斗，消灭了守敌，然后迅速由北向南朱荷湾攻击；同时，各参战部队也从城南攻入朱荷湾，对顽军形成了南北夹击的包围态势，不久便将敌人压缩至郊外的3座炮楼里。王丹侯见大势已去，抛下部队，和国民党县长化装逃走。13日下午，新四军发起总攻，顽军已成乌合之众，很快被全歼。与此同时，赶来增援的顽军也于途中被新四军打援部队击溃。

据统计，新四军第五师共歼灭顽军1600余人，缴获步枪850支、轻重机枪15挺、迫击炮2门、子弹2万余发、电台1部、电话机5部、马12匹。此次战斗，不仅打退了顽敌的进攻，粉碎了国民党顽军割断新四军第五师与第二师、第七师联系的企图，更为进一步巩固江北、发展江南奠定了基础。

育，注重生产劳动。勤俭公诚，服务大众，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和平。复兴、复兴中华，才是新中国的儿童。”院训和院歌都是智澄自己创作的。他选聘的教学人员才德高尚，多是流亡大学生或中小学教师中的佼佼者，其中有多名中共地下党员。

智澄爱童如子，以院为家。除了出外办事，都住在院里，细心照顾儿童们的生活起居。他十分推崇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既当严父，又做慈母。“管、教、养、卫”无微不至，对难童进行体、德、智全面发展。他从健身强国的理念出发，重视抓院内的体育和操练，教育学生讲究卫生，预防疾病，加强锻炼；要求因陋就简办好病室，给儿童及时防治疾病；还亲自抓儿童保育工作，夏季深入宿舍检查蚊帐有无破烂，冬季检查衣被可否御寒。

抗战后期，经费非常吃紧，西北儿童教养院千余名难童赖以生活的专项经费，时常不能按时、按数拨付。智澄多次请求，甚至曾多次变卖自己的财物，买回面粉，聊补孩子们的断炊之急。智澄先生虽竭力奔波，却始终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后以自杀向国民政府抗议，经费才得以部分解决。

1946年6月，西北儿童教养院更名为“社会部陕西第一育幼院”，一直延续到1949年12月汉中解放，院长一直都由智澄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成为汉中地区社会福利院，专门收留孤儿弃婴，赓续西北教养院的办学方针。